

粉碎資產階級的哲學史觀

為建設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史而鬥爭

蕭蕙父 李德永 唐明邦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史是一門年輕的科學。它一直在鬥爭中成長着。

遠從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直到目前黨所領導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社會主義革命已取得偉大勝利，中國哲學史這一領域，一直成為馬克思主義和一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激烈鬥爭的重要陣地。這種現象不能說是偶然的。這是因為，只有馬克思主義才使歷史研究和哲學史研究開始成為科學，迫使一切“唯心主義從它最後藏身所中，即從歷史觀中，被驅逐出來”^①；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哲學史觀和一切唯心主義的哲學史觀的对立鬥爭，始終是階級鬥爭的直接反映。伴隨着階級鬥爭的起伏和發展，這兩種哲學史、兩種哲學史觀的鬥爭，從五四以來懸亘了近四十年，至今尚未熄滅，並且在1957年春天當資產階級右派發起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瘋狂進攻的同時，這一鬥爭曾達到新的尖銳的程度。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中國哲學史，正是在同資產階級的偽科學的哲學史作長期、反復的鬥爭中得到不斷的發展的。因此，粗略地回顧一下這個發展和鬥爭的歷程，進一步推動這個鬥爭向縱深發展，對於建設科學的中國哲學史，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在我國四千多年的珍貴的历史文化遺產中，包含着極其豐富的哲學遺產。在我國历史上，每當社會發展的轉折時期，又都會出現過當時哲學家們對以往哲學思想的批判性的歷史總結，這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思想史上是一個優良傳統。但是在封建社會中、當然不可能產生任何科學的中國哲學史。

近代中國資產階級以它固有的軟弱性，在文化思想戰綫上剛剛舉起反封建的“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很快就被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所擊潰而“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在這種條件下，除了極少數的資產階級哲學史家在整理史料和考辨源流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外，幾乎所有資產階級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全都是偽科學的形式來掩蓋其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思想內容；他們所寫的哲學史，都是用來論證或演述他們的反動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的。為此，他們任意顛倒是非黑白、歪曲歷史事實，頑強地表現出資產階級

① 恩格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 135頁

②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27頁

的党性，把進攻的鋒芒直接指向馬克思列寧主義。

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已在中國廣泛傳播，黨成立以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已蓬勃興起，在這一時期的唯心主義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基本上都是作為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和敵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武器而出現的。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成為貫徹反動唯心主義的哲學史觀的代表作，前者用以鼓吹帝國主義的反動哲學——實用主義，後者以維護封建道統的姿態爬上了反革命的文化舞台。到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了配合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偽科學的中國哲學史成了投靠反革命營壘的資產階級“學者”手中的重要思想武器。當時大批唯心主義的中國哲學史論著，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其中，還混雜了一批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托匪分子的“著作”。直到抗日戰爭時期，配合着蔣介石的降日反共高潮，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還進一步掀起了一股文化思想上的黑暗逆流，藉口討論“傳統文化”問題，企圖從歷史上反動思想傳統中去為法西斯蔣王朝編造“理論上的根據”。所謂“新陸王學派”，“新程朱學派”等等，曾經烏煙瘴氣，盛行一時。這時，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及一系列“貞元之際所著書”，可作為帝國主義腐朽哲學和封建傳統毒素相互揉合的典型代表。關於這些著作的社會作用，馮先生在最近發表的“四十年的回顧”一書中曾經自白：“我已經公開地和正式地要在中國哲學界舉起白旗，維護垂死的中國封建社會的‘道統’。這時候正是抗戰的前夕，不久以後，我就陸續發表了所謂‘貞元之際所著書’，自命為建立了一個繼承封建社會的‘道統’的‘新統’，自稱為新理學。就以此擔任起‘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的反動任務。所謂‘正人心’，就是要人一心一意擁護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和國民黨政權。所謂‘邪說’，‘淫辭’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謂‘跛行’，不是別的，就是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①。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舊中國社會條件下所產生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中國哲學史，無論是旨在販運美帝的實用主義哲學而屬於買辦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胡適型”的，或是為了鼓吹封建復古主義而基本屬於大地主階級思想體系的“梁漱溟型”的，或是把上述兩者巧妙地揉合起來而“獨標新統”的“馮友蘭型”的，全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兇惡敵人。它們不但具有鮮明的反動政治目的，並且在唯心主義世界觀的指導之下，只能運用歪曲歷史、厚誣古人的可恥手段，來偽造中國哲學史。例如，胡適就用他的實用主義來向中國哲學史“開刀”，他揚言要以“化黑暗為光明，化神奇為腐朽”的方法來“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也就是要把“中國哲學史”變為美帝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反動宣傳品。馮友蘭先生貌似客觀的“中國哲學史”，也自稱他是採用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方法來寫的；並肯定“客觀的真實之於寫歷史者正如康德所說‘物之自身’之於知識”，因而“寫的历史及寫的哲學史亦惟須永遠重寫”，就是說，為了曲學以阿世，可以任意隨便寫，因為“古之哲學家不可復生，究竟誰能定之”^②。問題十分顯然，象這樣一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所產生的資產階級哲學家，他們所寫出的中國哲學史，除了“被冒牌學者的新名詞或愚蠢的無黨派性所掩蓋着”^③的反動性以外，當然不可能具有絲毫科學價值。如果說，中國早期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史家，例

① 馮友蘭：“四十年的回顧” 40頁

②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 “自序（一）”、“緒論”

③ “列寧全集” 第14卷 379頁

如章太炎的著作里还有某些可以肯定的有价值的因素的话，那末，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基本上都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列宁曾把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的合理内核，比作“粪堆”里的“珍珠”^①。我们可以看到，五四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史代表作中，则几乎全是一些粪堆上的毒草。

为了和这些粪堆上的毒草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史，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经孕育起来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一开始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认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同时就提出了“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的战斗任务，并指出必须和当时“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的一切“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旧史观，展开坚决的斗争^②。李大钊同志当时所写“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原人类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等文，便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科学地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开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迎击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利用哲学史阵地发出的进攻，例如瞿秋白、鲁迅等对胡适的“整理国故”的反动目的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揭露和批判^③；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直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胡适的所谓“整理国故”相对抗^④；在关于中国社会史（包括中国哲学史）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既揭穿了托匪叛徒对中国历史及中国哲学史所作的极端荒谬的伪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同时也击败了资产阶级猖狂一时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并在斗争中为科学的哲学史开辟了草莱。

此后，随着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高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扩大，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著作之后，又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了“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的号召，接着更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部不朽的巨著，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工作者和哲学史工作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最强有力的理论武装，从此，科学的哲学史的建设工作，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跃进到一个新的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在批判和揭露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哲学史观方面，在对哲学史的系统研究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绩。当时的工作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方面比他们在政治方面还要落后，还要无能，他们虽然拼凑出一些哲学史“大纲”、“概论”之类来和马克思主义对抗，但不仅没有摆脱封建主义思想的枷锁，就是连哲学史料的整理工作也没有能够超越前代学者，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因此，为了建设科学的哲学史，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任务，一方面不得不自己来清理中国数千年来浩繁的哲学史料。另一方面，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必须继续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西方中心说”或“世界主义”的哲学史观，中国封建复古主义的“道统论”的哲学史观、中国资产阶级各式各样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以及公开和暗藏的托洛茨基主义及一切修正主义的哲学史观等等，进行坚决的斗争。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工作者，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斗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 255页

② “史观”“李大钊选集” 290—291页

③ 鲁迅：“伪自由书”中“光明所到”、“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等文

④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爭的武器，因而能夠在和困難作鬥爭中，在和敵人作鬥爭中，使自己得到發展，邊干邊學，大破大立，在中國哲學史這個長期被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所盤據的陣地上，插上了無產階級的紅旗。

在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國哲學史領域內的階級鬥爭，隨著馬克思主義在全國範圍內領導地位的確立，鬥爭形勢和力量對比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可是，鬥爭的火燄並沒有熄滅。有一部分資產階級哲學史家，還時時準備利用中國哲學史這個陣地來實行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的復辟陰謀。因而，建國十年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史的建設工作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同時也進行了頻繁的戰鬥，仍然是在和資產階級的哲學史觀短兵相接的鬥爭中得到發展的。

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及以後關於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等資產階級反動學朮思想的批判，都廣泛涉及到哲學史方法論的原則問題。“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更直接引起了關於明清之際哲學思潮的研究和爭論。通過批判和討論，掃除了過去資產階級哲學史家對明清之際的偉大思想家的種種歪曲和誣蔑；同時，對中國近代啟蒙思潮發展的社会條件和歷史特點等問題，都有了更符合實際的科學了解。

緊接着，展開了對胡適、梁漱溟等反動哲學思想的廣泛、深入的批判，同時也就展開了對胡適、梁漱溟等影響下的其他資產階級學者的學朮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工作者，都奮起參加這一次和革命事業和科學事業都緊密相關的戰鬥，並取得偉大的戰果。由於胡適、梁漱溟等反動的唯心史觀，憑藉着解放前在反動政權支持下的政治優勢，傳播很廣，在中國哲學史領域甚至居于統治地位，受其毒害影響的哲學史工作者不在少數，因而這次鬥爭具有對資產階級哲學史觀及其著作進行總清算的性質。

經過這一系列的批判鬥爭，科學的中國哲學史已茁壯地成長起來，特別是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導下，更加速了這種生氣勃勃的發展，新的科學研究成果不斷地涌現出來。

在理論思想戰線上，公開的敵人被打潰了，並不等於鬥爭的結束；相反的，鬥爭只會更複雜、更深入，因為隱蔽的敵人總是更狡猾。列寧指出過：“歷史底辯證律是這樣：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也換上一套馬克思主義的衣衫。內臟腐朽了的自由派，企圖在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形態下復活起來”[●]。事情正是這樣，有一些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和哲學史觀的學者教授們，“換上了一套馬克思主義的衣衫”，實際上偷運唯心主義的私貨，以中、外哲學史“研究”作為陣地，希圖負隅頑抗，伺機進攻。他們又都不約而同地在修正主義的白旗之下集合起來，這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已掌握了廣大羣眾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學朮領域中階級鬥爭所表現的新特點。這表明：“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面的鬥爭。而在这个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他們經過了相當時間的“理論”準備，一方面摘抄了不少被他們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詞句，作為護身符；另一方面又搜羅了不少他們認為可以難住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國哲學史上的“難題”；同時，又製造了一套集中攻擊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方法論的精巧論綱，諸如對哲學遺產的“抽象繼承法”，對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關係的“師生朋友

● “馬克思學說的历史命運”、“列寧文獻”兩卷集，第一卷77頁

●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30頁

論”、“互相滲透論”，历史唯物主义“古已有之論”，反对馬克思主义哲学史党性原則的“中国例外說”，以及沿襲資產階級“文化类型說”的所謂“中国哲学特殊論”……等等，并且还公然提出了“为爭取唯心主义的更高评价而斗争”的反动口号，从而，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新阶段，党提出了百家爭鳴的方針之后，若合符节地配合着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阴谋，在1957年1月由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問題座談会”揭开的一場大論战中，資產階級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所发起的进攻，表现了相当猖狂的性質。

这一次延續几月的、集中在中国哲学史問題上的大論战，是解放以来哲学史工作中两条路綫、两种哲学史觀斗争的繼續和发展，也是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誕生以来进行全綫出击、夺取陣地的一次規模最大的战役。虽然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队伍还很年輕，但由于有了党的领导和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了历次斗争的經驗，在这场斗争中取得重大的胜利。在揭破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各种伪装中，大大提高了鑑別能力；在回答資產階級哲学家們提出的所謂“难题”时，大大磨炼了自己的理論武器；在奋起应战、全綫出击中，也就夺取了更多的陣地，壮大了自己的队伍。特别是这次哲学史問題的大論战和紧接着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互相呼应、互相交錯的这一事实，深刻地显示出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之間的合規律的联系。这对于广大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是一次极其深刻的革命教育；同时，对于进一步粉碎資產階級的哲学史觀，建設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进一步在哲学史研究中深入貫徹列宁的党性原則，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跃进发展，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已磅礴于全中国，一切腐朽的意識形态正在土崩瓦解。特别是党所领导的教育革命的全面胜利和党所提出的“厚今薄古”方針在历史科学中的具体貫徹，哲学史領域中的两条路綫的斗争向縱深发展了。整个說来，資產階級哲学史觀及其修正主义的表现形式，在馬克思主义的批判之下，已全綫潰敗，宣告破产。但是，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現象，当哲学史工作中一般地確認了在遺產繼承問題上必須繼承和发揚唯物主义傳統这一原則时，有的人便开始用顛倒主流和支流、割裂現象和本質的方法，把历史上唯心主义的反动体系——加以美化而把它們都說成是唯物主义，于是孟子、惠施、董仲舒、朱熹、二程等等唯心主义者都成为唯物主义者了；甚至認為“白虎通义”的世界觀比王充的唯物主义还深刻^①；把“中庸”的“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說成是“接触到了存在决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存在这个真理”；就是这位崇拜“中庸”的作者，由于被“中庸的人性論”所“感动”，主張要去“吸取封建道德中的精华哺育我們”^②。这种种傾向，实际上是用美化古代唯心主义的方法来为当代的唯心主义打掩护，用主觀附会来代替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目的在混淆哲学史上两条路綫对立斗争的界限。这是在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觀节节胜利下所出現的一条更加隱蔽的修正主义路綫，已有同志正确地指出来：这是一种“主觀主义和新国粹主义傾向，主觀主义是它的方法，新国粹主义是它的根本立場。……它的矛头是指向‘修正’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③。面对着这一切，不进行批判斗争是不行的。矛盾斗争永远是前进的动力。

● 張德鈞：“王充論衡和白虎通义的世界觀”爭鳴月刊第1期

● 刘澤如：“中庸的人性論” 27頁

● 关鋒：“反对哲学史方法論上的修正主义” 28頁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哲學史工作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調和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在鬥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就是要在徹底地“破”，堅決地“立”的鬥爭中，把科學的中國哲學史更好地建設起來。

二

四十年来中國哲學史領域中兩條路線的尖銳、複雜的鬥爭，鮮明地表現了兩種哲學史觀的根本對立。大大小小的爭論問題雖多，但始終是來源於兩種哲學史觀的原則分歧。資產階級的偽科學的哲學史觀，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體系的組成部分。它是唯心主義世界觀和唯心史觀在哲學史領域中的貫徹，把哲學史偽造成為替唯心主義哲學作註釋和為資產階級剝削制度作辯護的工具，成為麻痺勞動人民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工具。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哲學史，乃是无產階級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哲學史領域中的貫徹，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觀的產生，使哲學史第一次貫徹成為科學，從而標志著一切舊哲學史的終結。它以哲學思想鬥爭的歷史經驗和具體規律，來武裝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它以共產主義思想必然勝利而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必然崩潰的信念，來鼓舞勞動羣眾實行改造世界的鬥爭，因而成為工人階級手中革命的思想武器。

這兩種互相敵對的哲學史觀應用於中國哲學史，也就產生了一系列原則問題的根本分歧：

首先，關於哲學思想產生的經濟基礎及其發展的動力問題，兩種哲學史觀作了完全相反的回答。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觀，堅決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原理，認定歷史上哲學思想的變化、發展、交替、升降等情況，只能從物質生產方式這一社會基礎和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這一根本動力中去求得解釋。正是由於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發展及其所表現的階級鬥爭的發展，才引起了上層建築中哲學思想的發展變化。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觀的理論基石。雖然基礎對於哲學這一特殊意識形態的決定作用是間接的，哲學和其他各種意識形態之間有著互相影響，哲學思想本身還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和承襲性，但這正表明經濟基礎通過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而最後決定著哲學的發展，哲學思想則通過這些中介而為經濟基礎服務。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觀正是這樣深刻地闡明了哲學史上各種思潮發生、發展的必然性，從而使哲學史成為科學。

反科學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哲學史觀，儘管花樣繁多，歸根結底認為哲學思想的演變是偶然的，至多只是由於思想本身的要求或某種精神因素的刺激，而與社會物質生活無關。他們用思想來說明思想，得出了各種荒謬的結論。例如，胡適認為“時勢生思潮”是“很不容易找出來的外的綫索”，只有哲學家的思想方法才是能夠“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的“內的綫索”；而思想方法的不同則是由於“個人的才性不同”，從而影響到各個哲學家的“見解也不同”。馮友蘭先生曾把哲學思想變遷的原因歸之於“哲學家各有所見”，而“所見”不同則與哲學家的“人格”、“性情”、“氣質”、“經驗”、“個性”等“有

大關係”。梁漱溟先生則認為哲學思想“點點俱是天才的創作，偶然的奇想”，根本反對從經濟基礎的變革中去找尋哲學思想變遷的“因”。目前資產階級哲學史觀的捍衛者，還仍然把哲學史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歸之於哲學思想本身的“互相滲透”、“互相轉化”、“互相影響”；把唯物主義發展的原因歸功於唯心主義的“刺激”、“启发”。顯而易見，他們完全否認社會經濟基礎對哲學意識形態的決定作用，而用思想意識上的一些偶然的原因，來解釋哲學思想的變動，從而否認哲學史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發展、鬥爭的客觀規律。因此，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呢？還是某種精神因素引起思想發展？這就是兩種哲學史觀第一的和最基本的分歧。

與此相關，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觀和資產階級哲學史觀的第二個根本分歧點在於是否承認哲學思想的階級性和党性。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直接表現；在階級社會中哲學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刃相割、二論相訂”的對立鬥爭，則是階級鬥爭在思想領域的集中反映。為什麼在同一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經常有不同的哲學思想體系同時并存並相互鬥爭？這是被這個社會制度本身所具有的階級矛盾所決定的；從古到今哲學家們對哲學基本問題之所以有不同的解決，也是被他們的不同的階級地位決定的。從哲學史的總的發展方向和趨勢來看，唯心主義歸根到底是維護舊的經濟基礎的思想武器，為一切反動階級所擁護；唯物主義歸根到底是批判舊制度的思想武器，為一切進步階級所擁護。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者認定：任何哲學體系都是一定階級的世界觀。都是直接、間接為它的經濟、政治利益服務的。正如列寧所說：“最新的哲學象在兩千年前一樣，也是有黨性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按其實質來說，是兩個鬥爭着的黨派”[●]。

資產階級的哲學史觀根本否認哲學思想與階級鬥爭的聯繫，否認哲學思想的階級性。他們在所謂超階級、超政治的幌子下，實質上是宣揚為資產階級反動政治服務的唯心主義哲學。其實，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党性原則正是資產階級的党性原則。胡適拚命攻擊馬克思主義哲學党性原則，他說：馬克思主義者“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性，無形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恨心。……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許多根本不須有的慘劇”。人們看得很清楚：“偏向”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對中國人民的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深懷“階級仇恨心”的，正是胡適自己；他所宣揚的實用主義和庸俗“進化論”正是用來“救濟”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方法和藥方”，對於中國人民來講，根本沒有什麼“建設”作用，而只有反動作用。馮友蘭先生在其舊著“中國哲學史”中，企圖用“心理狀況”來掩蓋哲學家的階級意識；極其可笑地把唯心主義的孟子稱為“軟心腸”的哲學家，而把唯物主義者荀子誣蔑為“硬心腸”的哲學家[●]。目前資產階級哲學史觀的捍衛者們仍然力圖否認哲學思想鬥爭的深刻的階級根源。賀麟先生認為：哲學是超階級的，它遠處在政治鬥爭的“大炮射程之外”。他為了掩蓋哲學路線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階級實質，而把兩者說成是“師生、朋友的關係”。張恆壽先生公開提出：要“完全克服在唯心、唯物的套子上，貼階級標籤的缺點”。在他看來，我們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唯物主義為進步階級服務、唯心主義為反動派統治階級服務，只是一種“主觀附會”和“教條公式”。因此，他認為孟子、董

● “列寧全集”第十四卷 379頁

●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 352頁

仲舒的唯心主義哲學與他們的反动政治立場沒有必然的聯繫，王充、范縝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哲學同他們的進步政治立場也沒有必然的聯繫。資產階級哲學家們總是千方百計地抹殺哲學思想的階級性，來掩蓋哲學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聯繫。馬克思主義者則是始終不渝地從一切唯心主義的虛偽言詞背後揭露其階級本質。

哲學思想是不是有發展的？哲學思想的發展是不是具有內在的、必然的規律？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與資產階級哲學史觀發生根本分歧的第三個問題。

馬克思主義認為，哲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有著自己發生、發展的过程。科學的哲學史就是“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上的哲學思想的發展史，首先是哲學的基本派別即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孕育、形成、發展以及它們相互間鬥爭的歷史。……也包括辯證法和形而上學孕育、形成、發展以及它們間相互鬥爭的歷史”[●]。科學的中國哲學史的任务，就是要根據我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和當時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具体情况，科學地闡明各個歷史時期哲學思想發生、發展以及它們相互鬥爭的規律。我們認為：整個中國哲學史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這兩種矛盾着的世界觀發生、發展和互相鬥爭的一個長流；每個歷史時代的哲學鬥爭乃是這兩種世界觀的矛盾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的哲學思想體系乃是這兩種世界觀的矛盾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不同的矛盾方面。所有這一切，都被社會物質生活和階級鬥爭的發展过程所制約，而成為一個合乎規律的發展过程。

資產階級的哲學史家，最先而且唯一把哲學史當作一種“統一的发展鏈條”來研究的，是黑格爾。但是黑格爾的發展只是絕對精神的自我發展，他根本不懂得哲學發展依賴於社會物質生活，因而只能以他主觀猜測的一些規律強加在哲學史身上。中國資產階級哲學家們由於其階級的軟弱性和理論思維的貧乏，他們既不敢承認哲學思想的發展，更不敢承認哲學思想發展的規律。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給哲學史所下的定義就是：“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後，和學派的系統，一一記敘下來，便成了哲學史”。從這種記流水賬式的中國哲學史中，當然看不出什麼規律和發展。因此，胡適在其“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結論”中公然宣布：中國古代哲學在先秦以後由於有了所謂“懷疑主義的名學”、“狹義的功利主義”、“專制的一尊主義”、“方士派的迷信”，就忽然“中絕”而且“真死”了。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也是否認或歪曲哲學史的發展及其規律的。他認為：哲學史的材料，“你可以隨便給它解釋，差不多是願意怎麼說就怎樣說”[●]。但是事實上馮友蘭先生的隨便解釋還是被他的階級立場制約着的。他把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的鬥爭當作是哲學史的“逆轉”，把唯心主義反對唯物主義的鬥爭當作是哲學史的“正路”[●]，正說明他隨意篡改哲學史發展規律和發展方向的階級本性。

在關於哲學史的發展規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觀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哲學史觀還存在着另一個根本分歧點，那就是關於哲學發展的普遍規律與中國哲學發展的特殊規律之間的關係問題。

● 蘇聯科學院編：“哲學史”第一卷“導言”

● 馮友蘭：“四十年的回顧” 22頁

● 馮友蘭：“新原道”

馬克思主义者認為，根据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和哲学发展的普遍規律，对于各个民族的哲学史都具有普遍的真理，但这些普遍規律是通过各个民族的哲学发展的具体特点表現出来的。因此，在研究中国哲学史过程中，既不能忽視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特点，更不能脫离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則。只有严格遵循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才能揭示出中国哲学发展的規律性和真正特点；而这些特点，也不过是普遍規律的特殊表現形式。例如，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所环绕的不同問題，如天人問題、名实問題、形神問題、道器問題、理气問題等等，尽管各有其特殊的形式和内容，但归根到底都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这一哲学基本問題在各个方面的展开。由此可見，普遍規律寓于特殊規律之中，特殊規律不能脫离普遍規律而存在，二者的關係是对立統一的辯証關係。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就是要根据馬克思主义關於哲学史的一般原理，結合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来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具体規律和特点。

目前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路綫，以至曲夸大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来达到否定馬克思主义方法論的目的，并导致反动的复古主义。他們根本拒絕用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論的一般原理来分析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他們認為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論的原則，是一些“教条”，与所謂“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本来固有的条理脈絡”格格不入。他們按照自己的階級愿望把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現象加以片面地夸大歪曲，声称发现了所謂中国“民族哲学”的“特点”。宣揚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的反动口号，反对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們所发现的所謂“民族哲学”的“特点”，乃是最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动意識。右派分子張岱年就是这样，他把“不贊成走极端”的“中和”观念和慣于“从反面看問題”的“反衍”观念，說成是中国“民族哲学”的“特点”。并据此而制造出一套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反动理論。資產階級哲学史家长期伪造的“民族文化类型”的反动謬論，便是目前哲学史工作中誇大和歪曲民族特点的修正主义的理論依据。列宁在粉碎俄国崩得分子的“民族文化”的資產階級口号时，早已闡明了无产階級的“两种文化”的观点，毛澤东同志在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發揮了列宁的思想，严格区分了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文化和优秀的人民文化。在哲学史工作中，馬克思主义的“两种文化观”和資產階級的“文化类型說”，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統一的理論和修正主义的夸大民族特点的观点，都是根本对立，不可調和的。

两种哲学史观的根本对立，除了上述几个基本的原則分歧以外，还有其他方面。諸如關於繼承哲学遺產的态度、目的和方法的問題，關於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評價問題，对历史上长期被湮沒、或被封建学者与資產階級学者所排斥于哲学史之外的先进思想家的掘发問題，以至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对象、范围、分期，哲学史史料的整理、考訂、鑑別的方法……等等，在馬克思主义者和資產階級哲学史家之間，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这些問題，在这里不再一一論述。

总之，从以上簡單的論述，已充分表明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和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是根本对立的。資產階級的哲学史观是反动的、伪科学的，它只能导致对哲学史本来面目的歪曲。而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科学地揭示出了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普遍規律，只有坚持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論的基本原則，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才能在粉碎資產階級伪科学的斗争中胜利地发展。

三

為了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觀具體地運用於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我們首先必須學習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偉大榜樣，而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方法論原則同中國哲學發展的历史實際相結合。這就必須做到真正以毛澤東思想為綱。

毛澤東哲學思想，是我們偉大時代精神的精華，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高峯。它把我們民族的智慧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誕生，是我國幾千年來哲學思想發展史中最偉大的革命飛躍，是中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因此，只有從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高度，來總結過去五千年來的哲學历史，才能洞察中國哲學發展的历史辯證法，才能辨清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精華和糟粕、鮮花和毒草，才能真正完成清算、總結和繼承祖國豐富的哲學遺產的任務。

根據我們初步的研究，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對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有着巨大的意義。

“實踐論”深刻地闡明了認識來源於實踐的真理。毛澤東同志更具體地教導說：“自從有階級的社会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我國勤勞、勇敢而智慧的勞動人民，長期以來從事改造自然和變革社會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就是一切知識文化及其概括和總結的哲學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深厚泉源。在毛澤東同志這一科學思想的指導下，我們在研究哲學史的過程中，就必須抓住兩條綫索：（一）要闡明作為哲學思想主流的唯物主義的發展和勞動人民的生產實踐及與之相適應的自然科學的發展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二）要揭示出历史上的哲學思想鬥爭和人民羣眾的階級鬥爭、尤其是長期封建社會中的偉大農民戰爭之間互相推動的客觀邏輯。這就是說，必須弄清楚哲學思想的發展對於勞動羣眾的生產鬥爭實踐和階級鬥爭實踐的依賴關係，這樣，才有可能闡明中國哲學史的內在規律。

就一方面說，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作為人類認識發展的主流的唯物主義，必然是和勞動羣眾的生產鬥爭及自然科學的發展緊密相聯系的。歷代唯物主義的哲學家，總是吸取了當時勞動人民改造自然的鬥爭經驗和自然科學成果，依靠這些人民的智慧，來向反動唯心主義和宗教世界觀作鬥爭，捍衛和發展了唯物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史上許多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往往同時又是卓越的自然科學家，或者認真研究了當時的自然科學成果，認真總結了勞動人民的生產鬥爭經驗，從而把唯物主義思想推向前進，並給予唯心主義和宗教迷信以沉重的打擊。例如，王充對兩漢神學目的論的摧毀，范縝對南北朝宮廷佛教的打擊，劉禹錫、呂才對神祕主義的鬥爭，王夫之、方以智、戴震等對理學唯心主義的致命批判，都是和當時的生產與科學的發展及他們自己的自然科學修養分不開的。中國哲學史中辯證法思想的發展，也是和我國長期封建社會中天文學、農業科學、醫學等一定程度的發達分不開的。因此，遵循着毛澤東同志的教導來建立科學的中國哲

● “整頓黨的作風”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17頁

学史，应该把关于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史和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作为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支柱。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历史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基本泉源，才能阐明它们的发展的动力和规律。这是我们面临着的一项任务。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哲学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出現的。哲学斗争服务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又推动了哲学斗争的发展。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大数之多、规模之大、威力之猛，是世界历史所仅见的。正因为如此，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思想就十分丰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在农民战争中曾涌现出许多农民群众自己的革命领袖和优秀思想家，在他們和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中，不仅实行了武器的批判，并且創造了批判的武器，象汉末黄巾领袖和明末李自成、李岩等都直接提出过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思想和原始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是我国哲学史上极光辉的一页；其次，正是由于大小数百次的农民革命战争的推动和鼓舞，使一些虽是出身于剥削统治阶级的先进思想家，或多或少地突破了自己的阶级局限性，关心社会生活，同情劳动人民，并在人民群众的反复、激烈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吸取了智慧和力量，因而把自己从事的理论战斗和当时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他们之中，有的提出了反映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的各种学说思想，有的直接参加了农民革命成为他們的代言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剥削制度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①。因而，这些都是我国哲学史上的珍贵的思想遗产。应该说，我国历史上的战斗唯物主义传统，正是和历史上暴风雨般的农民战争互相呼应而形成的。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革命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和阶级斗争实践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泉源的指示，在哲学史研究中，坚决贯彻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两种文化的观点，使过去被资产阶级的哲学史所抹杀排斥的“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和值得纪念的“真正的文化英雄”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项任务。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教给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来对待旧的傳統，要用具体分析具体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一切复杂的现象。“矛盾论”从方法论上给了我们以解剖哲学史这一复杂运动过程的根本的指导线索。

整个哲学史，象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发展史。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斗争。这种斗争貫串于哲学史的始终、永远不会停止。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教导的：“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整个中国哲学史以及它的每一时期，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互相联结，互相斗争，构成了一个矛盾的总体。应该怎样在研究中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抓住其主要线索，暴露这一过程的本質呢？这就只有遵循着“矛盾论”指示的根本原则，即必须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地分析。就是说：“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

①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 “列宁全集”第一卷393頁

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關係，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後，又各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鬥爭”^①。毛澤東同志在這方面更作出了輝煌的示範。如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結合中國文化革命的具體歷史特點，深刻分析了中國近代思想的矛盾發展史，即包括“五四”以前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五四”以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思想戰線上複雜鬥爭的全貌。

毛澤東同志區別了當時思想戰線上的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與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文化思想、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文化思想；對於這樣幾個矛盾著的方面的相互關係，每一方面的特定地位，各個方面互相依存、互相鬥爭的具體形式和具體方法等，都作了具體的深刻的分析，因而暴露了這一時期思想鬥爭過程的本質及其發展的規律。我們必須學習毛澤東同志這樣的分析複雜矛盾的方法，把它運用於整個哲學史的研究工作中。事實上，中國哲學史各個時期的思想戰線上的矛盾大都呈現這樣一個幾方面互相依存、互相鬥爭着的局面。我們的研究任務，就是要從當時的經濟生活條件和階級鬥爭狀況出發，通過對矛盾的各個方面進行具體分析，來掌握這樣一個矛盾的總體，暴露這一鬥爭過程的本質。如此才能把哲學史上兩條路線的鬥爭生動而具體地揭示出來。

“矛盾論”指出，由於矛盾的升降變化，使過程顯出階段性來；在不同的階級上，矛盾的質是不同的。正因為如此，按照不同社會發展階段劃分哲學史的幾個時期，就必須找出不同時期哲學思想鬥爭在其內容和形式上所表現的質的特點。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並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②。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哲學鬥爭和封建社會的哲學鬥爭之間的差別性問題，關於明清之際哲學鬥爭的特點問題，關於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哲學鬥爭的特殊規律問題，都應該按照“矛盾論”指示的原則，進一步研究解決。

“矛盾論”告訴我們：“在複雜的事物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往往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由於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長期存在，社會經濟基礎中往往包有各種成分，因而，在中國哲學史上，同一時期常常有幾種哲學思潮同時存在，互相鬥爭，特別是每當歷史大轉折時期，更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而展開爭論的問題，也多種多樣。如戰國時期、明清之際、五四時期，都是如此。因此，抓住各個時期哲學思想鬥爭的主要矛盾，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就會“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因而對某些哲學家就不能判定其應有的歷史地位。

矛盾的不平衡性，規定了矛盾雙方必有其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而雙方“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正是表現出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力量”^③。因此，對於哲學史上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鬥爭的每一戰役，不僅要知己知彼，洞察全面；更重要的，要看到“新陳代謝”是不可抗拒的規律，先進的、新生的、正確的思想，即使開始還較微弱，但它具有不可戰勝的威力。我們之所以熱情歌頌王充、范縝等的戰鬥功勳，就在於他們幾乎是在孤軍奮戰的條件下，依靠真理而擊潰了強敵；我們之所以重視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家，就在於他們思想中有

① “矛盾論” “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

②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23頁

③ “矛盾論” “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 793頁

新的因素萌芽，敢于冲决网罗，别开生面。看到“星星之火”，肯定它“可以燎原”，是方法问题，也是立场问题。至于历史上每一个哲学家的体系，应该历史主义地具体分析其内在的矛盾。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唯物主义思想家，都不可避免地有着不彻底性；某些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也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内核。因此，区别一个哲学体系中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弄清真理和谬误在其体系中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是哲学史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资产阶级学者所玩弄的客观主义和折衷主义，实质上是企图一方面夸大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个别正确观点，另一方面又夸大某些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局部谬误，藉以否定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不能容忍的，必须加以批判、肃清。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曾着重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指明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贯彻这一精神，就是说，必须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和教学目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毫不含糊地公开申明它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是无产阶级手中的一个战斗的工具。为此，就必须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坚决贯彻党所指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方针。在对待哲学遗产的态度上，必须贯彻两种文化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坚决反对复古主义和虚无主义，反对“抽象继承法”。

科学的中国哲学史，通过参加党所领导的理论思想战线上的兴无灭资的斗争，直接服务于当前我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早已指出我们时代的伟大特点，就是“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①。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实践，包括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因此，必须进行理论思想战线上的批判斗争。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将以历史上思想斗争的规律、唯物主义长期战斗的历史经验来武装我们，帮助我们在当前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中，完全立于不败之地。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将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来阐明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必然消灭而共产主义思想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这就能够帮助我们扫荡一切腐朽意识形态的垃圾的斗争中，树立起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念和所向披靡的共产主义风格。我们民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这个传统和遗产的唯一合法的继承者；也只有当工人阶级总结和继承了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加以马克思主义的熔炼和改造，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担当了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光荣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就如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②。

我们坚信：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的哲学史观一定会被肃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中国哲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95页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522页

史一定能夠高速度地建設起來！因為，我們有黨的領導，有黨的總路線的光榮照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樣百戰百勝的科學武器，還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工作者的團結的集体的創造性的努力。